

18世纪到20世纪“中国之欧洲”的演进¹

(法) 米丽耶·戴特丽 著

唐睿

译

1988、1989年间，艾田蒲，这位一直孜孜不倦地企图让比较文学从固步自封的“欧洲中心主义”解放出来的比较文学大师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了两册题为《中国之欧洲》的著作。在著作的第一卷里，艾田蒲试图“呈现出欧洲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，实际上竟为欧洲导入了有关中国科技，思想以及艺术的认识”²，“从罗马帝国一直到莱布尼茨”，就像书本副题所写的一样；而在第二卷里，他则追溯到欧洲在启蒙运动时期，从仰慕中国到排斥中国的演变。这部著作并不以穷尽主题为目标；后来者的补充使之不断完整；但多亏了这部著作我们得以明白，中国在17、18世纪曾经怎样借着旅人，特别是传教士，深深地激荡以及丰富欧洲文化。而人们一般都认同，19世纪，中国从一个众多思想家、作家及艺术家的楷模变成了一种欧洲的对立面、一个被鄙视的国度，一个被帝国主义大国瞄准的目标。而近几十年来，许多研究成果又表明，20世纪的欧洲思想、文学与艺术又由于重新对中国产生兴趣、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欣赏而获得激励和更新。

这种得到普遍认同的历史观点已在集辑《中国的遗产》(The Legacy of China)的结语里被概括了出来：“受到欧洲旅行家及旅居在华的欧洲人所做观察研究之刺激，欧洲知识界对中国的兴趣……被分割成两个阶段，当中隔有相对漠然的一段时期；其中第一阶段由耶稣会士利玛窦于1600年抵达北京从事他的传教工作开始算起，然后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七、八十年代；至于第二阶段，则由20世纪初开始，一直延续至今。”³我在这篇文章里希望探讨的，正是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期间这段“相对漠然的时期”。我提出的问题是，欧洲知识界对中国的兴趣是否真的在19世纪一度止息；换言之，从17、18世纪之交到20世纪中国重新对欧洲文化发生影响，这段时间是否有可能让我们看到“中国之欧洲”的某种延续。考虑到该问题涵盖之广，脉络之复杂，我在本文里将探讨范围收窄在文学以及艺术的领域，并按着艾田蒲就“中国之欧洲”所提出的四个主要元素分别陈述。它们分别是：旅人提供的大量有关中国的资料、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、大众中发展出来的“中国趣味”，以及前面三个元素在文学创作领域产生的回响。

1. 提供中国资讯的欧洲人

在《中国之欧洲》里面，艾田蒲对研究外国旅人的中国游记予以重要的肯定他相信“哲学精神大抵来自于对旅行者的经验进行的思考”⁴。尽管他以不少于

¹ 这组论文出自“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法德文化与中国”国际研讨会，2009年5月13日至16日，由法国亚眠庇卡尔大学(Université Picardie Jules-Verne)“语言文学关系研究中心”(C.E.R.C.L.L.)举办。

² 艾田蒲，《中国之欧洲》(L'Europe chinoise)，第二册《从仰慕中国到排斥中国》，巴黎，伽里玛，1989，11页。

³ 雷蒙·杜笙编，《中国的遗产》(The Legacy of China)，牛津，牛津大学出版社，1964，355页(这结论乃来自G.F.胡德逊)

⁴ 艾田蒲·《中国之欧洲》，第一册《从罗马帝国到莱布尼茨》，巴黎，伽里玛，1988，215页。